



为建设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詹尤克专访阳和平

激流网志愿者翻译

[编者按：此文对原英文版的访谈进行了部分的修改和更正。](#)

每月论坛编者按：以下对阳和平(Fred Engst)的专访由詹尤克(Onurcan Ülker)主持(两者简介附后)。访谈于2017年4月7日在北京进行。同名文章由(印度)政治经济研究所(RUPE)于2018年1月19日首发。本文已经过编辑和重新排版。正如RUPE编辑在原文中所介绍的那样,阳和平的这篇专访“在亲身经历与深刻思考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透彻的解读”。的确,与我们之前发表的纠正反毛思想的文章一样,阳和平也有力地驳斥了对毛的主流评价。我们对“真正的‘中国奇迹’是社会主义”这一节印象特别深刻: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不如后毛泽东时代,阳和平对这种论断进行了雄辩地反驳。通过对统计数据的直接比较,以及对如今学界“GDP回溯计算方式”的明确批判,阳和平告诉我们“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经济基础,为如今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根本前提。”

詹尤克：能否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阳和平：我1952年生于北京，在中国古都西安长大。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父母调回北京。我生命中的头二十多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主要是在西安—

一后八年是在北京。虽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但当时的北京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乱”。中学毕业后，我和同学在工厂工作了五年。我的另一些同学去了农村，我也报名要和他们一起去，但因为我是“大鼻子”，没有批准。有了我的先例，后来我弟弟妹妹被安排到了安徽的茶场。我1974年去的美国，在那里生活了三十来年。期间我经常回中国：1988年我在中国住了一年，之后的1989年，北京就发生了六四事件。2000年夏开始我也在北京任教一年。其他时候，我也不时地回来看父母、同学。2007年我最终决定迁回中国。从那之后，我一直在北京教学和做研究。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要弄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可以说，这十来年是最富有成效的时期。

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詹尤克：所以说，你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生活了很久。西方学者通常批判毛泽东主义使得人民过度参与到政治中来，最终也因此动摇了社会稳定与国家体制的建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对民众的“过度政治化”是否造成了某种混乱？

阳和平：这个问题还真是别有用心。可以归纳为：你是要为压迫阶级辩护，还是要设法推翻压迫阶级？换言之，这个问题在于：你推翻旧的压迫阶级是为了变身为新的压迫者，还是为了彻底消灭人压迫人的制度？

革命队伍里有这样的人：他们反对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但对于人压迫人的制度本身，他们却并不反对。一旦革命者成为统治者，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他们是与同人民一道，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还是变成新的压迫者？如何避免革命者变身压迫者，才是问题的实质。

从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将农业成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人均收入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也将私有企业成功地转变为国有企业或合资企业。所以总体上，中国从一个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基本上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工厂里、城市里以及乡下的人民开始很快就面临着新的问题。针对官僚主义的矛盾处理方式，工人和学生开始罢工罢课。有个著名的例子：军队不顾农民的生计，非要在河南新建一个机场。为此，他们试图将一切都用推土机推倒。农民别无选择，只能抵抗、封路。这个例子出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詹尤克：毛泽东因此而直接指责邓小平……

阳和平：是的，就是邓小平干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问题在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每天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矛盾，你该如何处理？你应该如何组织生产？人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当权者该怎么办？是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声音，找到解决办法，达成共识？还是对人民的意见置之不理？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民主化？。

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有了两个非常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旧地主、旧资产阶级，因为失去对土地和企业的控制而非常愤怒，他们想要推翻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关于如何进行日常生产，又有一堆细节上的矛盾。如何管理学校？如何管理

农业集体？如何处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冲突？管理者的权限在哪里？这些问题当时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矛盾的双方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在实现途径上有所分歧。如何更好、更高效地经营工厂？如何使中国尽快地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如何在中国实现工业化？这些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如何处理呢？

到了1956年，那些新官僚，也就是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很明显已经不顾人民群众的感受。所以毛主席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整风运动，以批判新官僚，纠正党风。用一句美国俗语来说此刻就是“狗屎打到电扇上了”(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有些人在革命时反对的是旧的压迫者，而不是压迫制度本身，他们想要成为新的统治者。这些人感受到了整风运动的威胁，他们想要将攻击的矛头转向那些批评他们的人。

我认为这就是那些人所谓的“混乱”。他们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用一种“正常”的方式处理问题呢？——“正常”这个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那些掌权者、那些统治者所谓的正常。中国为什么要搞这样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这些想要问的是，中国为什么不回归旧有的管理方式？为什么不让工厂的管理者变身老板，一切都维持不变？为什么要对那些人进行批判并试图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实际上，那些人不愿去改变他们的思路。面对批评，他们感到了威胁。成为众矢之的，让他们很不爽。在1957年，党内上层也因此将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运动”。这完全就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我研究这段历史最大的发现。

其实这就是理解毛泽东时代最后二十年的关键所在。这些冲突应该如何化解呢？第一种方式是“治病救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矛盾。因此，大字报和群众运动是克服党的领导层问题的主要工具。第二种方式是矛头向下、向非党员，去找他们的茬儿。此方法的根本在于“运动”群众，告诉他们谁是“敌人”，鼓励他们去攻击那些被打成“反动分子”的人。此时的目的并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打倒反对自己的对手。这就是反右运动的方针、路线和政策。

所以你提的问题需要在这个矛盾中进行审视：如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如果离开了这个视野，那些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事情，看上去就会很荒唐。

詹尤克：那这如何反应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呢？

阳和平：对人民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举个例子。工厂领导如何进行生产过程的管理？如果生产进度落后，我们该怎么做？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很简单：就是靠胡萝卜加大棒：“如果工作不努力，就炒你鱿鱼；反之努力有奖”；或者说“我是老板，就是得听我的，我花钱雇的是你的肌体，不是你的大脑”等等。这是资本主义的处理方式。但如果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那该如何管理生产过程呢？如果生产过程中出了问题，该怎么做？我们应当开会研究情况，找到解决方案。如果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必然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克服这些困难之后，人们就会意识到，工人阶级有着解决问题的强大能力。一旦工人

群众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自身的整体利益，他们的创造力就会极大地释放出来。比如，八路军和解放军只有“小米加步枪”，怎么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就是因为他们坚信一个共同的理想，坚信能够推翻压迫。

工厂的日常工作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工厂领导总是责备工人生产低效，而不去了解问题的根源，工人就没有归属感，因而感到沮丧、绝望，就会偷懒、磨洋工，就体现不出工作积极性。发现问题的时候，比如看到机器出故障，他们就会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但如果他们有了归属感，如果他们有权去批判权威，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建议并能够被认真地对待，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就是自身命运的主人，他们客服困难的能力就会极大地提高。

再举两个对立的例子。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典型。我对大寨比较熟悉，去过多次，还在那里一度待过六个月。在大寨，你可以看到在没有任何外援和机械化的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是怎样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永贵将农民动员了起来，引导村民去讨论如何通过艰苦劳动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面貌。它本身就是一个大事迹。再举个反例。小岗村是邓小平改革初期推动的典型。十八户村民一直在斗来斗去。你家当上了生产队长，你就拼命贪集体的财产。我怼你，拆你的台，削弱你的实力。下次选举之后，换成是我当生产队长，我来贪污，你来怼我。角色再次转换……，长此以往这个集体肯定维持不下去。改革之后，邓小平居然将小岗村树立为“典型”，就好像几千年来，中国从没有过小农经济似的。真搞笑！

这就是反差。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时期

詹尤克：就如何增加产量，你刚才讲到了，资本主义方式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我认为这种区别根源在于认识论。毛主义的认识论基于以下假设：只有劳动者才拥有全部的社会实体知识，因为他们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资本主义主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永恒的。我想正是毛主义的这种认识，促成了“上山下乡运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被派往农村、工厂，去师从知识的真正主人，也就是工人和农民。你当时也参加过体力劳动。你从中学到了怎样的经验？你觉得毛泽东的方式真的可行吗？

阳和平：是的，当然可行。但主要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标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农用器械通常不是由坐在办公室里搞机械设计的工程师改进的，农夫更可能发现机器的缺陷所在。其实美国的农场往往有自己的车间，他们就在这里改进设备。农机经销商来了，看到了设备的改进，他们往往剽窃农夫的改进并将其完善。但知识必然是源自于实践；实践是所有知识的来源。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可以将这些知识理论化，而工厂里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工人可能理论工作做的不如他们，但归根到底，工人积累的实践，才是知识的主要来源。

也正因此，毛主席提出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将二者结合在一起，非常之重要。将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固然是其中的一方面，但我在中美两国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最关键之处在于生产目的。在美国，我们工人尽可能不对管理层提出技术改进的建议，因为我们害怕丢工作。就是说，你可以提出改进建议，

生产活动也会因此变得高效，但某些人可能会因此失业。所以，正因为工人和管理者的立场不同，工人就经常会破坏机械装置和生产线。老板们总爱说：“我们都在一条船上。”当然，如果公司破产，工人就会失业，失去工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都在“同一条船上！”但我跟你讲：即便他们“破产了”，只是说他们没有多余的钱而已，但他们还有活路。工人失业了就一无所有。

然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生产完全是另一个目的。领导不能克扣工资，不能开除工人，因为工人有“铁饭碗”。如果工人觉得管理者的工作要求不正确，他就可以怼回去。劳动纪律自然是要有的，但从根本上讲，车间里的所有人都基本上是打成一片的。领导负责给出工作指示，但这些指示一定要让工人觉得合理。如果领导只是在办公室一坐，喝喝茶，看看报，给工人做做指示，你作为工人就可以跟他讲“不要老坐在办公室里，过来跟我们一起干！”工人有权这样讲。谁来当领导，也要经过工人的认可。这并非是选举的政治概念。但如果工人要求换个领导，而他们的要求未被上级接受，工人就可以罢工、怠工。所以任何领导要想领导的更有效率都要得到工人的认同。再强调一次：关键在于领导不能开除工人，也不能克扣工资，在于“铁饭碗”。如果我要对你进行领导，我不能强迫你。我对你的领导只能是建立在你的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别！这就是人们参与生产过程改进的动力来源。我记得当时工人们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就如何处理一件事情，每个人的看法可能都不一样。有时候，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工厂的两派工人就因为冲突太严重以至于爆发了武斗。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另一个问题。

有人会说，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从未掌权。我不认同这种观点。实际上派系斗争和武斗恰恰说明工人阶级是掌权的。如果工人没掌权，他们就不可能因工厂的经营而发生冲突。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派系斗争的确不是什么好事，甚至是严重的灾难。但它也证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确实具有领导地位。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詹尤克：你在工厂做工的时候，目睹过派系斗争吗？

阳和平：我所在的工厂里没有。但我听说了很多武斗的故事。文革初期我去了一家煤矿，那里就有辩论，但还没有发生武斗。不过无论是保守派为了保护他们的领导层，还是造反派批评他们的做法，都是通过写大字报，举行示威游行，还有组织集会来完成的……我们也参加了很多集会。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主人。工人之间产生矛盾时，该如何解决？这才是关键问题。时至今日，总听人们说“民主”。很多时候民主是统治的游戏！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每天都在进行着积极有效的民主实践！天呀！你跟我讲，工人们为了捍卫自认为是正确的而发生争执，甚至动武！如果这还不算是工人阶级执政，这能是什么？文革中的武斗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表象，而非工人阶级无权的象征。

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詹尤克：你如何理解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你在毛时代中国的生活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阳和平：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谈谈。但实际上，我受到父母的影响更大。我的父母也是受他们父母的影响。我的外祖母卡玛丽塔·辛顿（Carmelita Hinton）创立了帕特尼高中，这个学校十分强调实践性学习。学校里有个农场，学生们除了给牛挤奶，喂料，他们也要做各种体育运动，去荒郊野外学习生存技能。这正是“动手实践”的方法，我的母亲也接受过这种教育。我的父亲是个奶农，他也是非常善于动手实践的。

但中国人的等级观念比较强。知识分子自觉高人一头，工人自觉低人一等。工人往往屈从于那些受过更多教育，掌握更多知识，拥有更多权威的人。我父母刚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很看不惯那些目中无人的知识分子。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我在毛泽东时代受过的教育以及父母对我的影响共同塑造了我如今的思想观念。

詹尤克：在毛时代的政治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工厂的知识青年，如今无论在中西方学界都被称为“失落的一代”。高层权力斗争与这些知青并无任何关系，但却使他们牺牲了青春。你对此观点如何评价？

阳和平：很明显，我不认同这种看法。首先，这不只是权力斗争的问题，这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之前也提到过。“权力斗争”存在于统治者之间，存在于压迫者之间。在走资派之间，当时自然也有很多权力斗争。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固然存在着走资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但真正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未来的发展道路之争。

至于你提到的知青“下乡”问题，确实非常有争议。谴责知青下乡决策的人，通常会忽略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实际上，被下放的知青在当时都多少享有一定的“特权”。我这里的说的“特权”指的是城市人口的福利比农村更多，而这是工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因此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你得有原始资本积累。中国不可能像之前英国那样，通过圈地赶人实现原始积累，也不能单纯靠剥削其他国家来积累资本。中国绝大部分人口都是农民，中国要怎样才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口还是在农村。

基于这个事实，中国所能做的，要么是向农民征税，要么是进行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但征税成本太高，难以持续。国家不得不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来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即工业品的定价高于其价值，而农产品的定价低于其价值。为保证交换顺利进行，也为了避免投机倒把分子靠工农业剪刀差谋取私利，国家对农产品收购实行了垄断，同时也建立了户籍制度，以保障城市居民低成本购买粮食，工人仅凭较低的工资即可保障生存。粮食以低价从农民采购，工业品（包括布匹、暖水瓶、手电筒、锅碗瓢盆等轻工业产品）高价向农民出售。在当时的体系下，早期工业化必然需要这种非等价交换。

打个比方，一个纺织工人一年的劳动成果可以换回十几个甚至上百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道理很简单：要开展工业化，国家需要开矿山，炼钢铁，制造生产设备，建设厂房等等。农民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需求。挖煤，挖铁矿石，将矿石熔炼成钢铁，用钢铁制造机器，造纺织机、造缝纫机，做衣服。这一切要有一个非常长的产业链，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需要吃饭。粮食从哪儿来？从农民那里来！不平等的交换就是这样开启了工业化的进程；这是工业化的基本逻辑。

实际上，这也符合农民的长期利益。因为，未来的农民不需要留在小农耕作中从事原始而辛苦的劳动，工业化会将农民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农机具和拖拉机。但要造拖拉机，你需要有钢材；要炼钢，你得有铁矿和煤炭。这些东西不是农民一开始就买得到的。但集体化使采购机械成为可能，也使得向城市供应粮食变得更加容易。这就是“户口”制度的根本逻辑。

但我们也要时刻想着对立统一。每件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中国有个词很好：“无奈”，字面意思就是“最坏条件下的最不坏选择。”或者说“没有更好选择时的最佳选择。”的确，不平等的交换是中国当时进行资本积累的权宜之计，但也有负面影响：因为剪刀差制度的存在，城里人觉得他们的劳动比农民更有价值。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不平等交换”只不过是国家粮食专营的一个结果，但也成了城里人产生优越感的原因。城里人的衣食有保障，价格还很低；农民却因为粮食配给制度，不能随便搬到城市居住，否则就无粮可吃，无法生存。在城市中，只有城里人的粮食有保证；如果农民要进城，他得从村里自带干粮。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会说：这限制了人们迁徙的自由。实际上，你看看拉丁美洲、印度，还有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贫民窟，就知道这种“自由”会带来什么！那里的无地农民确实可以“自由”地迁徙！进一步地分析，之所以改开以后中国的“农民工”可以“自由”地外出打工是以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早已完成为前提的。其实这些“低端人口”的居住条件和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相差无几。

毛泽东时代的这种户籍制度的负面结果就是：城市的教育与医疗设施更加完善，城里人更容易接触到文学艺术，城里人的生活改善的更快。这种地域分割是旧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延续了下来。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十分巨大，而且这个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送青年下乡就因此变得十分有意义。为什么？首先，它可以使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回馈农民。青年下乡为农村带来了知识、技术。其次，让城市青年见识农村生活，也给他们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别认为你在城里的特权是天赋的。你得知道农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才是占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才是国家的支柱。你可以说这样做效率不高，但这并不重要。这毕竟是城市人口回馈农民的一种方式：城里人因其特权地位而得到福利，现在自然要向农民付出代价。

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青年还是比较支持上山下乡政策的。他们知道农村的艰苦，他们也都经历过；他们觉得帮助农民是他们的职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剪刀差可以大大减少，但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 - 61]之后，工业品价格应该下降，农产品价格应该上升，但国家却陷入了僵局，出现

了有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斗争。很多事情没有顾得上考虑。国家本应当一面送知青下乡，一面缩小工农业剪刀差。但当时问题太多，他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邓小平当政后，破坏了知青下乡的政策。时至今日，有人说邓小平之所以取消政策是因为青年的反抗。但青年人为什么反抗呢？就我所知，很少有人真正的研究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并没有太多的青年反对这项政策。知青大规模的反抗始于1977年之后，即邓小平恢复了考试制度之后。所有的精英都离开农村去上大学。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和农民一起劳作的知青突然开始觉得：“哦，我懂了，我应该永远呆在农村，可你们却离开了！”正是这种现象破坏了年轻人的意志，打破了年轻人的共识，最终摧毁了该政策推行的缘由。

詹尤克：在“伤痕文学”中也没提到这样的事实……

阳和平：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完全理解青年人的观点。当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当一些人很明显的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情况下，他们的反抗也是必然的。

詹尤克：很多下放知青在日记中写过他们的农村经历。他们正是因此极少批判毛泽东去世后的政策转变。他们选择将毛时代的政策作为批判目标，尤其是上山下乡运动。

阳和平：是的。但据我所知，在邓小平执政前没有多少知青反抗的材料。当然，有过艰辛，有过困难。1975年出现了走后门风潮，在某种意义上，为1977年后结束上山下乡做出了铺垫。我见过几个上海知青谴责上山下乡政策，我就问了他们几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觉得自己为什么能享受上海户口带来的福利，凭什么农民就应该为你们提供这些保障？而你们又对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只是说：“这不管我的事！”

从个人角度讲，这些青年觉得社会对自己不公平。但大多数人，即便是那些批判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对他们的那段生活往往有着难以忘却的回忆，甚至倍感自豪，并不时地流露出对那种生活气氛和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想往。他们在农村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毕竟大家是在齐心协力搞建设，建设新中国，这总值得回忆。相比之下，如果大家是在工厂里受压迫，他们就不会有同样值得自豪的打工回忆。比如，在美国的电影文学中，我没有看到年轻工人兴高采烈地谈论工厂打工的“美好”时光。我在美国工厂打工十几年，这和毛泽东时代的生活经历根本没法比。

在美国，我只在军人中看到这种对往事的歌颂。海军陆战队、陆军特种部队的战士退役后，他们通常会回忆起过去有趣的共同经历。因为军队里是一个团队，大家在一起共事。当然，这里他们是为帝国主义卖命，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在军队中服役给他们一种抱团的感觉。这种凝聚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里是看不到的。

真正的“中国奇迹”就是社会主义

詹尤克：在官方言论中，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经济建设，或者说仅为简单的 GDP 增长。众所周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远不止于此。毛泽东想的是逐步消灭阶级差异，逐步建立劳动人民的直接民主。所以我要问：毛时代中国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吗？

阳和平：当然是这样。捍卫毛泽东时代成就的经常提及那时的人民是当家做主的。但我们必须同时驳斥中外资产阶级一致宣扬的改开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比毛泽东时代更快的谎言。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前几个月，出于好奇，我查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较了各类增长指标。GDP 的确是一个衡量指标。但除了 GDP 我也比较了粮食产量，布匹产量，铁路运输、发电量，煤炭产量以及一个衡量教育成果的普通高中毕业人数指标。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布匹产量和 GDP，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比邓小平时代和以后要更快。而且，真实情况是：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存在 GDP 这种衡量指标，现在的数字都是后来官方编造的！除此之外，毛泽东时代的服务业是不计算在当时统计的总产值指标内的。

在毛泽东时代，工厂里有宿舍、食堂、托儿所、图书馆、职业学校等等，这些内部消耗的东西都不算在总产值里。一旦把这些拆分出来，市场化，他们都计入 GDP（因为 GDP 衡量的是市场行为，所以在家看孩子不算 GDP，送孩子到托儿所算 GDP）。如果考虑到这个区别，我们发现，在毛泽东时代，即便是所谓的“混乱”的十年中，发展的速度还是快于或至少等于改开时代的发展速度。这是事实（见表 1）

表 1 中国经济几个基本指标的增长率*

年代	增长率 %	钢 铁	煤 炭	发 电	货 运	汽 车	高中 毕业	粮 食	布 匹	GDP
毛泽东时代 (1952-1976)		10.1	6.9	13.2	6.7	22.0	17.3	3.1	3.3	5.8
文革期间 (1966-1976)		8.1	8.7	11.1	7.3	16.5	33.1	3.7	2.8	6.0
改开时代 (1977-2015)		9.6	5.3	8.8	3.7	14.3	2.5	2.1	5.9	14.9

在我的分析中，除了 GDP 以外，我避免使用有可能被价格体系变动所误导的指标。我就看生产了多少布，生产了多少钢，发了多少电等等。这些实打实的指标少有重复计算的风险，也不受价格体系或通货膨胀的影响。我还排除了 1949 年至 1951 年经济高速恢复期的数据，仅选用了 1952 年到 1976 年的数据，然后与邓小平时期及以后的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实在令人震惊。在谈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只说人民做出了多少无谓的牺牲。这是无稽之谈。只有让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有如此快的经济发展！

同印度、巴西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国家进行比较，中国最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也相当的快。这不可否认。也正因此，如今人们总在说“中国奇迹”。但事实情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更快。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了：在苏联红军粉碎了白军的内战之后，从 1921 年到 1941 年搞建设，就把苏联从欧洲边缘的落后工业国家一跃成为高度工业化的超级大国，而且毁灭性的二战就是在他的本土上打的。与苏联相比，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像苏联一样，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经济成就。因而那些说毛泽东时代为了让人们感觉到平等却牺牲了经济增长是一个谬论，不真实。

不仅如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仅生产发展比之后更快，人们也坚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就是 1989 年六四事件的原因。大量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正是因为他们还以为政府属于自己。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或遗产！这是六四事件的一个基本事实。然而，主流学界完全忽视了文革对六四的这种影响。

社会主义遗产

詹尤克：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市场导向型改革，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但时至今日，我们只谈“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国际财团推动的其他模式都失败了。其主要原因是什么？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优于所谓的“计划经济”，你觉得对吗？如果没有毛时代自力更生的重工业基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否会取得如今的成就。

阳和平：很有意思，我发现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是一无所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发展困难，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一旦发现威胁到他们的垄断地位，帝国政府、跨国公司就会去摧毁第三世界国家的任何发展成就。当前中国能够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维护住了主权的独立。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经济基础为如今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根本的前提。这才是主要原因！时至今日，环顾世界，那个国家没有外国军队？哪个国家拥有完全地军事主权、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只有俄罗斯和中国。印度可能也有一点。如果不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发展逻辑，你就理解不了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

历史实际上是相当具有讽刺性的：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发展资本主义基础，就得先发展社会主义。毛主席曾经说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现在可以对其进行补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只能与帝国主义先切割，获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稳固强大的国民经济基础，才有可能重返世界资本经济的舞台。

詹尤克：听起来像萨米尔·阿明所提出的“脱钩理论”。

阳和平：说得对。要实现本土经济增长，你就需要脱钩。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中国在 1949 年就对外开放，那现在和菲律宾就没有什么不同，也不会比印度更好。印度经济本应增长，但没有持续增长的能力。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相对经济成就，源自于其主权独立。有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自己决定跨国公司可以进入哪些生产部门。中国政府绝不允许国际资本进入能源、交通、重工、金融和其他核心经济领域，其余的部门，比如汽车行业，中国只允许他们以合资形式进入。跨国资本当然是想建立独资子公司，但中国政府说：“就是这个条件，同不同意随你的便。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话，就得合资。”

如果中国人从 1949 年就搞中外合资，会怎样呢？那时中国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当我 1974 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每个省份都有能力生产汽车。虽然质量不是很好，有些甚至必须派师傅一路开一路修。但毕竟中国能够制造自己的汽车！一旦有了制造能力，就可以持续改进。如果你连汽车都做不了，一切也都无从谈起。当跨

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政府要求他们搞中外合资。因为每个省份都已经有了汽车制造业，中国就可以对他们说：“我可以造汽车的架构，我可以造轮胎，我可以造座椅，但我需要你的发动机、变速器，因为你们的比我们的好。其他的东西我们都能做。”这就是中外合资的运作模式。

中国得以再次融入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崛起的工业大国，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了完整的、本土化的、全面的经济基础。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正因为没有这些作为前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摧毁了他们的本土经济。菲律宾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热衷于新自由主义，时至今日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什么都没有！真悲哀。一把钳子、一根钉子都做不出来。他们只能制造最基本的东西。市场里要么是跨国公司的商品，要么是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工业品。

詹尤克：如果我说错了可以随时纠正我。你的意思是说，多亏了毛时代的遗产，中国仍旧享受主权红利。那你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的外国直接投资（FDIs）？长久以来，都说 FDI 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阳和平：我想这个观点完全是牵强附会。我是说，事实不是这样。外国直接投资机构的确在中国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其作用被大多数学者夸大了。中国实际上就是在窃取西方的技术。在主权的保护下，大量的山寨产品得以模仿、盗版国外品牌获得好处。中国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增速都要快，其原因就在于通过主权独立——经济独立、政独立治、军事独立——来缩小技术鸿沟，实现快速创新。可以大步前进，可以走捷径。中国没经历过固定电话，就直接步入移动通信时代。中国没发展录像机，就直接开始用 VCD 和 DVD。就算电影业今天也还是依赖于盗版好莱坞电影得以起步发展的。

让我举个例子明确一下：比如说，麦当劳进入了中国，中国从中学到了经验，本土的快餐行业就打败了麦当劳。再如，联邦快递进入了中国，现在已经被本土快递公司抢了风头。例子还有很多，但我們要注意：正是国家对核心领域的绝对主权，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否则阿里巴巴、微信根本没戏。

詹尤克：那国内矛盾呢？比如说，后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商品化带来的各种矛盾。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特别是那些农民工的状况，是否威胁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

阳和平：我们从毛泽东时代还继承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学者们经常忽略这一点：他们不理解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根源是什么？他们说是中国劳动力规模大，或者说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年轻。但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中国能享受人口红利，而其他劳动力廉价的国家却无法发挥其人口优势？这就非常讽刺了。主流学者和西方新闻媒体就这些问题的解释上，做不到自圆其说。

这对我来说一度也是个难题，我去了几次菲律宾之后，就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和当地人谈过话，试着理解他们国家的社会现实。我将菲律宾和中国做了对比，发现正是土改红利使得中国与众不同。土改给每个农民都分了一块土地，这就是中国劳动力廉价的关键。如果将中国、菲律宾的最低工资进行比较，你会发现相差不多。很多菲律宾的工人靠这个最低工资生活，陷于贫困之中。而中国的工人

虽然工资差不多，但境况要好很多。为什么？因为在菲律宾这样的地方，失地农民被迫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生，依靠最低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上有老下有小，全靠这笔工资。但中国“农民工”的家人并不完全指望他的工资，他们家里有地，抚养孩子，赡养父母的成本几乎为零。结论就是说：如果工人阶级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在农村进行的，就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如果以失地农民的身份进入城市，居住成本、子女教育成本、老人护理成本就要高得多。中国农村六十岁、七十岁甚至八十岁的人还都在田园中劳作，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他们有着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土地，即便哪天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还可以打电话雇人来耕种收割，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就可以。所以，老年人并不是年轻人的负担。知道这个逻辑，你才能理解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成因。正是 1949 年的革命使得土改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土改的话，中国劳动力不会如此廉价。对此，资本主义学者理解不了（或者避而不谈）。

如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也正是城市化。地方政府和炒房团将农民驱离土地以建立工业园区。将农民赶进城后，要想让他们生存，给出的工资一定要比之前更高。所以说，政府如今推动的城市化，恰恰正在提高中国劳动力的成本。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讽刺的地方。因此，我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学者、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其实并不理解它。

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福利

詹尤克：让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在毛时代的中国，几乎所有公共服务都是免费提供，或者只收取一个象征性的费用。这多亏了城市的铁饭碗制度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然而，如今有一些改革派和主流学者批评这种福利，他们说，当时这些福利的水平是相当的低。毛时代中国的社会福利是个什么水平？这些福利真的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吗？

阳和平：恕我做个小修正，不是一切都免费。首先你得是城市居民，这些服务没有涉及农民。有些是免费的，有些需要支付很低的费用。比如，住房并非都是完全免费的，你得支付象征性的房租。教育差不多是免费的，只需要支付书本费，但价格很便宜。

的确，当时的质量没有现在高。但在当时的条件约束下，这个福利体系的收益是巨大的。比如农村建立的“赤脚医生”模式，被世界公认为社会服务的成功典范。

詹尤克：连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都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荐……

阳和平：是的，很了不起！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当然没有医院高，但当时的医院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鉴于此，谴责赤脚医生水平差，简直是荒唐。你得看看当时的条件限制。我们得问问这些谴责者：有什么可以替代赤脚医生？中国是个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贫穷国家。我们从未说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富有；我们一直都在讲我们是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毕竟我们是个穷国。所以这样指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影响真的很大。中国的人均寿命大幅度地延长，中国人口寿命的增速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领先的，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相当快的。出乎我意料的是，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最恶劣的“三年困难时期”，最高的死亡率是 2.5%，这样的死亡率在印度的当期属于“常态”。

有的人为了谴责毛泽东时代，编造出很多谎言。真令人难以置信！在自然科学中，比如物理、化学，我们可以做实验，我们可以做到客观。但是在社会科学中，颠倒黑白比较容易。自身利益会干扰我们的所见所闻，我们都不可避免有所偏颇。但这并不是说完全做不到客观公正，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公开宣扬我们的偏见。不幸的是，像弥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完全受意识形态影响。我就纳闷了，他怎么就热衷于通过“亚洲四小龙”来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他完全不提苏联的经验，他只是简单地选取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事例。

“三年困难时期”与党内斗争

詹尤克：提一个新的问题：你之前似乎也提到过，西方主流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指责毛泽东是个血腥的独裁者，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不惜大肆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主流学界通常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来证明这个观点。你对此如何理解？毛泽东真的是在搞“乌托邦主义”？

阳和平：我不知道“乌托邦”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发现当人们对别人的行为表示不可思议的时候，就说他是“疯了”或在搞“乌托邦”。这是没有什么客观标准的。你怎么定义“乌托邦”？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乌托邦”，这就是他们给马克思主义打的标签。

“毛泽东屠杀人民。”这句话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党内斗争中，是毛泽东反对处决人，这和很多其他人的想法完全相反。毛泽东是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观点的少数派，因为如果你杀错了人，就无法挽回了。主流学者也总会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死亡归咎于毛泽东。只要在社会主义里死了人，都是毛泽东的错。这样的说法没完没了，荒唐至极。事实上，你找不到毛泽东要处决党内某个人或者秘密暗杀某个人的任何直接指令。

毛泽东时代最受责备的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人们死于饥饿。但是，如果你足够深入地去了解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毛泽东为什么把一些人称为“走资派”的原因。毛泽东在发生灾难之前早就警告过。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在中国激烈斗争的一部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不在乎死多少人，就像特朗普一样。他肆无忌惮地下令轰炸叙利亚等国家，完全是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屠杀人民，做一切事情。中国党内和领导层也有这样的人。为了捍卫他们的官衔和特权，这些官僚不在乎死多少人。“三年困难”的发生正是走资派所致。

起先，在五十年代初，走资派反对合作化。合作化实现之后，他们又把它推向极端，大搞“共产风”、“浮夸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我的直觉是他们发现在大集体里更容易地从农民那里征集粮食。前面我们谈论了工业化的进程需要从农民那里征粮，那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农业模式就

太难了。但是，一旦合作化了，那么官方就可以很容易地收集到粮食。我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推行“共产风”的原因。为了更容易地抢夺农民的余粮，他们不在乎农民的生计。我看这是他们对待合作化态度的 180 度大转弯的起因。

詹尤克：如今的官方历史不会有记载。但实际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所有这些人也都全心全意支持“共产风”，并煽动“共产风”。

阳和平：确实如此。他们是“共产风”的推动者，而毛泽东则是批评他们的人。但毛泽东是少数。合作化后这些人毫不顾及农民的利益使得毛泽东震惊。不过要理解“共产风”还是离不开工业化这个背景。

巧合那时候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 156 个工业项目逐渐上马。这些项目需要很多的工人。这意味着那时候需要大量的粮食来供给这些工人。所以哪个省份或地区能从农民那里获取更多的粮食，那里的领导就得到上级的称赞，他就像是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因为所有这些项目都在推进，需要大量的粮食来维持工人的生活。所以，如果你的省份能向国家缴纳更多的粮食，你就是了不起的人！这解释了“共产风”的动机。例如，河南和安徽的领导虚报他们的粮食产量。1958 年，各地确实都收获了很多的粮食。这是一个丰收年。但 1959 年河南、安徽等地发生了自然灾害。所以实际粮食生产下降了。然而地方领导人不承认粮食的欠缺，相反地，他们掩盖实情。他们坚称农民隐藏粮食。猜猜是谁在 1959 年给党中央写了那封臭名昭著的信，说农民私藏粮食？是赵紫阳！如果农民藏粮，你怎么办？有两种选择：走资派的主张是无论如何，国家必须把粮食征集过来！毛泽东反问为什么农民要藏粮呢？他看出这意味着国家和农民之间产生了矛盾，生产关系出了问题。主张我们不应把公社当作核算单位，因而推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农民生产的粮食由生产队分配。每个生产队有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每个人的努力和他所在集体中获得的粮食有更直接的关联。刘少奇，邓小平，赵紫阳等那时候反而喜欢人民公社的大集体，倾向于这种更简单、更大规模的办法，直接由公社那里可以获得所有农民生产的粮食。实际上，毛泽东警告过他们，说：“如果你这样做，会饿死人的！”我们有毛泽东年谱来证明这一预言。

赵紫阳报告后，许多官员下乡，试图弄清楚农民把粮食藏在了什么地方，他们逼迫、威胁和殴打农民。他们甚至强行拿走了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那是造成“饥荒”的原因。随着饥荒的蔓延，人们开始逃离灾区。不怀好意的地方官员派民兵围追堵截，将这些人赶回到他们的村庄，掩盖事情真相。如果有人写信给党中央，他们就在省会扣押下来。例如在一个村庄里，只剩下四名没有饿死的党员。他们写了一封血信。他们想方设法把它送到河南省外寄给了中央。当党中央下来调查发生的事情时，他们发现情况糟透了，甚至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试图立即运送粮食来解决问题。此刻，河南省的吴芝圃下令逮捕成千上万的生产队长，指责他们是“罪犯”。他把责任归咎于基层……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别看这些人自称为“共产党人”，其实他们就是纯粹的法西斯分子，只是穿着“共产主义”的外衣而已。他们更关心的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和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在乎有多少人为此丧生。这就是帝国主义一贯的做法。为了资本的利润，他们会殊死拼搏。

此后，毛泽东意识到这些人在党内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三年困难”之后，猜猜他们主张如何克服困难？包产到户！先是 1950 年代初期，他们反对合作化，后来他们力推“共产风”，饥荒发生后，他们又主张包产到户，责怪合作化！这就是“走资派”！毛泽东看到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们倒打一耙，把饿死人的罪过栽赃于毛泽东。因饥饿而死人最多的是河南、安徽和四川。但四川的饥荒并不是由于灾害造成的。相反地，四川是丰收了的。邓小平是四川人。据说是邓小平命令当时四川的李景泉把粮食调运出去的。李景泉起先担心四川粮食调运出去太多，农民就会饿死，邓小平据说声称他宁愿四川山沟里的人饿死也不能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饿死！原本是这些人推行的政策导致了 1959-1961 年间的巨大困难，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他们宁愿让四川人民承受饥饿和死亡！看了邓小平 1989 年的表现，我相信他是干得出这种事的。这是关于饥荒的真相。死亡最多的地方也是 1958 年“浮夸风”刮的最厉害的地方，而不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方。事实上，自然灾害影响了其他一些省份，其他一些地方更糟。但那里的人们并没有饿死。

我那时在陕西。有些地方遭了大灾，但是我们没有饥荒。当然，营养不良。没有足够的食物，我都经历过。我记得河南人来到西安逃荒，到了我成长的草滩农场。多年后，我们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去北京开会的陕西省领导听其他省份的报告都说是大幅度地，甚至成倍地提高了他们那里的粮食产量，说他们省可以给国家提供多少多少吨的粮食。事实上，陕西的粮食生产可能只增加了 2%-5%。情况看起来很糟糕！陕西省的那个去开会的领导很着急，打电话给留在西安的省委书记，反映其他人都是如此遥遥领先！我们却如此落后！请示我们应该怎么办？即使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省领导只让上调了 10% 左右的增长。这就是陕西如何避免饥荒的原因。

人民为什么不反抗资本主义复辟

詹尤克：你提到了在毛时代，走资派与革命者的斗争。毛泽东与党内右派斗争的方式就是发动人民群众推翻官僚精英，鼓励他们参与各层次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可就我所知，劳动群众捍卫毛时期政策的力量并不够强大，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反对“四人帮”和其他左派的运动中，很多人被逮捕、被清理，根本就没有发生民变。你怎么解释这种反差？

阳和平：邓小平他们上台并不会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反对社会主义”。这确实能迷惑人民群众。但我觉得，不能说没有大规模的抵制。要么你怎么解释 1989 年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恰好说明了群众对新生统治阶级本能的反抗。虽然冲在前面的是支持“西方式民主”的学生，但支持学生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而他们参与进来并非是要支持抽象的民主本身。这个情况我有所了解，因为 1988 年我就在北京。有一次在去农场的公交车站，我听到人们抱怨中国的各种问题。一个人说：“这群该死的学生，他们提出的问题要是与我相关，我就跟他们一起干了！”所以说，并非是抽象的“民主”使这些人反抗，他们反抗的是腐败和通胀。看到少数富人享受着他们创造的财富，他们感到愤怒。学者们总是对这种现象一带而过，但我们要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要问：“为什么群众的情绪激昂？”

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没有拿起武器保卫所谓的“四人帮”？我觉得，即便没有抵抗，也不能说人民没能保卫社会主义。“四人帮”被捕的时候，你知道指控他们的第一项罪状是什么？是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说他们妄图架空毛主席！老百姓只看高层的表面举措自然无法了解全面情况。即便是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清楚“一举粉碎”的意义。我很笨，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二十多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1976年出了什么事。我之前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政变。

詹尤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当时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并没有和人民群众建立天然而密切的联系。

阳和平：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贴标签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我试图分析过文化大革命为何失败。我在这里只提一句，主要原因是工人阶级不成熟。他们没有处理好内部矛盾，而是深陷在派性斗争中。

文化大革命初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唤醒和发动群众。群众起来后，如何避免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派系斗争成了关键问题。不假思索地，不惜动武去镇压给领导提意见的造反派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生动例子。当保皇派拿起武器镇压批判领导的人时，他们也就放弃了自己监督领导的权利。这就是我说的“工人阶级的不成熟”。这种现象导致工人阶级的分裂；走资派却团结一致。此刻，革命领袖能够打出的牌就越来越少，最终被逼到了墙角。

詹尤克：就我所知，1976年政变过后，文革中很多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和工人积极分子也都被拘留、判刑。但没有证据表明，同事的被捕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阳和平：正如我之前讲的，走资派并没有立刻显漏出他们真实的嘴脸。这些人都是极其精明的政客。他们绝不会在人民群众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修正主义者不会公开讲：“我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总是要耍小把戏。他们总在说：“情况变了，方法也要变。”对很多人来说，这话相当有理。

当这些走资派开启中国改革进程的时候，他们在城市中进行了小小的尝试。工人阶级的反抗是猛烈的，所以在城市中无法推进改革，继而他们转向农村。事实证明，农村就是社会主义的薄弱环节。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有的村民分散于遥远的山区，我们为什么要强迫他们参与集体劳动呢？让我们在这些地方实施包产到户吧！”听上去很合理。于是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将土地承包。只消几年时间，他们就实现了整个农村集体化的土崩瓦解。当人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力。走资派控制了军队，控制了政府，控制了国家宣传机器……他们要什么有什么。

但文化大革命后的无产阶级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无产阶级的分化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他们的目的同样也很模糊。他们往往不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面对狡猾的游说，他们很容易就变得摇摆不定。走资派说，

“在毛泽东时代你们的工资从未上涨过。我们给你涨工资！”邓小平于是就开动印钞机，钱越印越多。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有钱了。最后发现通胀了，但是太晚了！走资派暂时的收买了农民，收买了工人，收买了知识分子。一旦他们巩固了权力，他们就把毛泽东主义者从党的队伍中踢出去，孤立他们，排挤他们。够聪明！他们是老练的战略家！中国有句话叫：“温水煮青蛙。”等青蛙意识到水太热时，他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太晚了。

詹尤克：来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终会失败。你是否认同以下这个观点：毛泽东主义者所谓的“社会阶级”概念有些模糊，革命者正是因此而无法有效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阳和平：是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来对阶级进行分析，很难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因为生产资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是私有的。领导人无法将财富传承给子女，即便要转移财富，既不安全又不合法。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的“国有资本集团”——也非个人所有。也因此被称为“公有”。

要给社会主义中的“阶级”下定义，我觉得应当强调谁有决策权，以及权力如何行使。资产阶级更关注发号施令的权利，而不是自己的名号。比方说，对于比尔盖茨或洛克菲勒，“基于自身世界观来塑造世界，制定决策”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资产阶级也试图发号施令。不管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都不会关心别人的意见。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这就是资本主义的DNA。

用传统思路分析，脱胎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是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标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度，因此，从社会主义制度中产生的新生产资产阶级，和成长于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两者的“娘”长得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也很不一样。我再打个比方，看看形而上学的人是怎么分析这个问题的。你看蛆和蚯蚓，都似乎属于不会飞的物种，而苍蝇和蜂鸟，都似乎属于会飞的物种。我们在这里只看他们能不能飞。会不会飞的确是一个重要评判标准，但毕竟蛆和苍蝇是同一物种。所以你不能说，“苍蝇——或资产阶级——来自于封建社会。但蛆连飞都不会，又怎么能是资产阶级呢？”这就很荒唐！如果你等等，蛆自然会变成苍蝇。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就是还处在“蛆阶段”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包含了“苍蝇阶段”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

毛主席的政治遗产

詹尤克：最后一个问题：概括地讲，毛泽东去世四十多年后，毛泽东主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下了什么遗产？

阳和平：毛主席的遗产……多的难以估量。世界各地的人民在推翻旧体制后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避免革命者演变为新的压迫者？离开了对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懂得毛泽东是如何试图克服这个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怪圈就会一直循环往复下去。

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摧毁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也不清楚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具体途径。因为时代还不允许。列宁经过多年的实践后意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形成一个高度自律的先锋队政党，得以发动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才有可能战胜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控制社会的优势。十月革命仅仅四年后，1919年五四运动仅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中共成立没费什么周折，因为列宁的贡献使得中国革命少走了好多年的弯路。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工人阶级下次掌权的时候，就不会从头开始。他们就会避免犯其他革命犯过的错误，就知道如何避免官僚特权，就知道如何坚持群众对先锋队的监督。

社会主义绕不过去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先锋队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矛盾。目前为止，除了毛泽东的贡献以外，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失败于此。斯大林只强调党的领导，忽视了群众的监督。社会民主党人只强调民主，否定了先锋队的领导。这些理论都不管用。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探讨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只是当他意识到走资派问题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走资派已经十分强大。毛泽东花了五、六年的时间（1957-1962）终于看清了走资派的本质。

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者只有在走资派出现以后，才能够识别他们。在马克思的时代，他不可能考虑走资派的问题。列宁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有机会，但他错过了，他搞砸了。作为一个领袖，斯大林“可能是个混蛋，但毕竟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混蛋。”我是说，斯大林犯了很多很严重的错误。走资派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出现，他只会将其流放，屠杀，处死，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斯大林主观上是捍卫工人阶级的政权，反对资本主义的复辟，但是他和中共很多干部一样，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我称那些人为不自觉的走资派。我们得把自觉和不自觉的走资派区分开来。有些人只是工作作风不好，有些人喜怒无常，有些人专横。这些人并非故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的不深。因此，他们压制不住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喜欢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最终他只是靠自己，靠直觉。他觉得谁不好，就杀谁，从肉体上清除。最终，他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发动群众，只从国家机器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必然导致官僚专制。

我觉得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也没抓住重点。托派分子完全没能真正理解问题之所在。他们的解决方法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都否定了党的领导。他们的民主一直停留在“职工代表大会”的阶段。但工人之间意见不同该怎么办？他们压根就没提这个问题。在和中国的托派的争论中，我总会提出这个问题。

詹尤克：真的吗？中国如今还有托派人物？

当然，我是说他们之前并不强大，但过去几年间，托洛斯基主义的市场有些发展。可能是因为托派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像似解释了中国的现实。由于人们对当今官僚集团的憎恨，批判官僚国家的托派观点获得了进一步的关注。但中国的托派解释不了文化大革命，他们只能嗤之以鼻。

至于毛泽东主义的遗产……这个问题很难简单的概括。我认为毛泽东的遗产凝结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其他所有像“群众路线”这样的口号都不足以代表毛泽

东的贡献。首先，毛泽东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延续，不能与之割裂开来。其次，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问题上，他将马列主义进一步深化，以解释社会主义中特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在此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会继续存在。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复辟，在中国也的确复辟了。某种版本的“毛主义”与我也是不一致的。有些人觉得，现今中国当权的是修正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他们主张发动一场党内斗争将其击溃。但事实上，中国是个工业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政的就是资产阶级。

我想，“毛泽东主义的遗产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在问“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庞大。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有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辩证唯物主义”，有些人将其总结为“阶级斗争”，有些人说他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将其总结为“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以及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体”。所以说，归纳的角度有很多，但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至今生生不息——毛泽东的遗产也是这样。

詹尤克：那我把问题简化一下，要在二十一世纪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要借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都死了快半个世纪了。

阳和平：这个是必须做的！毛泽东所研究过的问题，他开创性解决过的问题，是所有革命者都会面对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谁。具体情况可能要具体分析，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党内斗争？”毛主席对此有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他高度概括地说过“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他又说过，“要乐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说的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各种斗争，说的就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毛主席的语录对于革命者来说非常重要，告诉他们要克服派系斗争，如何团结在一起。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团结是达成共识。在文革之前，所有这些都已经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

所以说，毛泽东在很多领域都有贡献。他的贡献和一般的学者不一样，学者只知道思考世界。有人觉得马克思也是这样，但实际上他也是社会活动家。每次活动后都会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他也并不是只为研究而研究。同样的，毛泽东的贡献不仅在于革命理论，也在于革命实践。否定毛泽东的人都很无知。我还没发现有哪个严肃的学者，能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展开有效的批判。

有些人就“三个世界理论”这样的东西否定毛泽东，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但他们也得理解，毛泽东也在不断探索。他所说的东西在当时看来都是很实际的。苏联当时确实是个很大的威胁——不仅是对中国。没人能预测苏联解体。毛泽东相信，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真理。一开始可能有很多假设，毛泽东总是致力于发现和思考，他不教条。举个例子，在大跃进初期，他也支持人民公社搞的公共食堂。但经过了几年的实践，他放弃了这个。

我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正试图搞清楚，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马克思无法研究走资派或帝国主义，对吧？在苏联解体前，毛泽东当然也不能完全认识到他的脆弱性。他只是尽其最大努力去分析罢了。如果当时人们将其理论推向极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认为毛泽东当时觉得“因为苏联是

主要威胁，我们就要将其他的一切都放弃。”即便是在抗日高潮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展了合作，但仍拒绝放弃独立性。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死板地套用毛泽东的理论，而不是辩证地使用，那并不是毛泽东的错。

詹尤克：实际上，在毛去世之后才开始将“三个世界理论”推导出其逻辑结论，主要是在1977年。

阳和平：邓小平将该理论推到了极端，并试图对一切重新组织。即便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美苏冷战对于世界其他民族也是有利用价值的。正如毛泽东早期就是趁着军阀混战来扩展红军，只有这样革命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一旦苏联解体，美国实现了一国独霸，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你不去教条地理解三个世界理论，这就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状况。事后回想起来，毛泽东可能高估了苏联的威胁，因为他那时候还看不到苏联政权的脆弱。怎么能怪毛泽东？谁都会犯错误，马克思犯过错误，列宁也是，斯大林错误就太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多预言都未成真。但依此责怪他们就很可笑了。

詹尤克：邓小平将“三个世界理论”推向了极端，1989年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而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又说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在很多方面是没有意义的。你是不是觉得很讽刺？

阳和平：当然。他和特朗普一样，都是个实用主义者。特朗普说话可能是一天一个样，这就是个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

詹尤克：十分感谢您能分享您的时间与知识。您的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

阳和平：不客气。

阳和平，生长在共和国的美国人。他父母阳早（奶农）和寒春（核物理学家）在二战后来到中国，参与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文革时期，阳和平是名“红卫兵”，然后当了五年工人，于1974年移居美国，打工十几年，并勤工俭学后获得经济博士学位。2007年回到中国，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并从事学术研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他也经常做各种主题演讲，比如“幸福何在？—理想与人生道路的选择”“洋‘红二代’眼中的中国六十年”“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等。就中国的一些问题，他发表了几个中英文成果。

詹尤克生长于土耳其。早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东科技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作为燕京访问学者，他又在北大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他现于国立成功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台湾“教育部”奖学金。他之前做过研究助理，研究员以及助教。他关于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的中国的部分翻译作品或文章刊于各种土耳其语期刊上。他翻译的“记住社会主义中国，1949-1976”（印度经济形势，No. 59&60, 2014）很快将在土耳其由 [Patika Kitap](#) 出版。

*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1、粮食增长率=(当年-去年)/去年在各个时期的均值。2、由于其余的指标是指数增长, 故用回归法估计指标取对数以后的时间趋势, 即取 β_1 在以下回归的估计值: $\log(y_t) = \beta_0 + \beta_1 t + u_t$ 其中 y 是指标, t 和下标 t 是时间, u_t 是干扰项。